



# 安妮·埃尔诺:个体与时代的“影像之书”

□李琦

2022年10月6日,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凭借其“勇敢又确切地书写从个人记忆中挖掘出的根源,疏离以及集体约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其近50年的写作生涯中,安妮·埃尔诺共出版了20余部作品,其写作特色主要是从个体生活切入,关注社会问题,聚焦个人与时代的联结,并且创造了一种融合个人史和时代史的“无人称自传”。除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个头衔之外,今年安妮·埃尔诺还尝试了“第一次跨界”,她和儿子大卫·埃尔诺-布里奥(David Ernaux-Briot)共同导演的纪录片《超八岁月》(Les Années Super 8)于5月在第75届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上亮相,并计划于12月在法国院线上映。全片时长约一小时,原始素材来自于1972年至1981年间他们家用一部超8毫米摄影机拍摄的影像,后期经过剪辑,并配有安妮·埃尔诺本人亲自撰写和朗读的旁白。

安妮·埃尔诺生于1940年,在诺曼底的小镇伊沃托(Yvetot)长大,她的父母在当地以开杂货店为生。埃尔诺先后在鲁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主修文学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法语教师。60年代前后,她嫁给了菲利普·埃尔诺(Philippe Ernaux),并生下两个儿子:哥哥埃里克和弟弟大卫,后者也就是本片的另一位导演。1974年安妮·埃尔诺出版了第一部作品《空衣橱》(Les Armoires vides),1983年出版了《位置》(La Place)并于次年荣获勒诺多文学奖。在出版于2008年的作品《悠悠岁月》(Les Années)中,作家抛弃了第一人称“我”(je),而是采用无人称泛指代词“我们”(on)进行写作,通过一张张照片引出对过去的回忆,将个人的小事与时代的大事融合在一起,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法国抵抗运动、阿尔及利亚战争、堕胎合法化、性解放、萨科齐当政等等,时间在她的笔下无情地流逝着。《悠悠岁月》一书出版后斩获多个法国文学奖,并且成为一代法国人,特别是一代法国女性的集体记忆。安妮·埃尔诺的文学成就不一而足,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实至名归。儿子大卫·埃尔诺-布里奥生于1968年,先后在安纳西和塞耳吉-蓬图瓦兹长大(正如纪录片中所呈现的那样),在大学期间他主攻科学方向,毕业后从事相关新闻节目工作,他参与了电视节目《E-M6》和《原来如此》,还为一些数字教育平台编写了《机器剧场》《语料库》《艺术与运动》等迷你剧。

事实上,纪录片《超八岁月》也可以看作一曲“六手联弹”,因为其素材几乎都是彼时安妮·埃尔诺的丈夫菲利普·埃尔诺拍摄的。表面上看,它是埃尔诺家的影像档案,记录了一家人在生日、圣诞、假期的日常图景,但同时,它犹如一扇窗户,呈现出当时法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特征。正如导演安妮·埃尔诺所言:“当我回看我们在1972年至1981年期间拍摄的超8胶片时,我意识到它们不仅是一份家庭档案,也见证了1968年后的十年间一个社会阶层的品位、休闲、生活方式、热爱与期待。我想通过引用我在那些年写的日记,把这些无声的影像融入个人、历史与社会的交汇叙述中。”超8摄影机拍摄的画面均没有声音,安妮·埃尔诺为它们撰写了文本,可以说,纪录片《超八岁月》和作家的其他作品一脉相承,并且因影像的介入弥补了文字的短板,进一步拓展了其文本维度与丰富内涵。

作家笔下的几个典型元素在纪录片中清晰可辨。首先是社会阶层。彼时安妮·埃尔诺的丈夫担任安纳西副市长,一家人住在市政府分配的房子。她在纪录片中介绍,在当时,超8摄影机是一件比洗衣机和彩色电视更令人心动的东西。菲利普·埃尔诺拿到相机后热衷于拍摄住所的装饰,包括精美的墙纸、从古董店淘来的小玩意儿等等,它们和超8摄影机一样,某种程度上成为当时中产阶级的象征标志。不仅如此,在上世纪70年代,拥有“闲钱”的中产阶级还热衷于去远方旅行。超8摄影机也记录下了他们一家前往智利、摩洛哥、阿尔巴尼亚、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其他国家的画面。1972年,在《新观察报》的邀请下,埃尔诺夫妇二人来到智利,彼时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推行了一系列“智利社会主义之路”的规划,包括进行大型工业国有化,给儿童提供免费牛奶,深化土地改革等等。在智利的所见所闻触动了安妮·埃尔诺,她想起了自己在20岁立下的誓言:我要写作,为我的阶层复仇。镜头之下,个人的游历与时代的变迁合二为一,安妮·埃尔诺以一个左翼知识分子的视角窥探着法国乃至世界的变化。

在纪录片中还可以看到安妮·埃尔诺母亲的身影,这一人物形象曾出现在《位置》《一个女人》等其他作品中,而母亲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正是作家拼命想要叛逆的阶层。安妮·埃尔诺的父亲去世后,母亲便离开伊沃托来到安纳西和他们一起生活。然而镜头下母亲的形象略微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她对家中墙上的装饰有不同的见解,常常身穿一件带口袋的花罩衫,或许是受到贫穷出身以及战争期间饱受饥荒之苦的影响,她总要在口袋里放一条手帕和几块方糖。安妮·埃尔诺说,母亲和

丈夫代表了其社会旅程的两个端点:起点和终点。安妮·埃尔诺无疑实现了她的“阶级叛逆”,但是这远远不够,她想要说的话还很多,甚至可以认为,她的文学之路恰恰开始于她有意识地对“阶级叛逆者”这个社会概念概念的探讨与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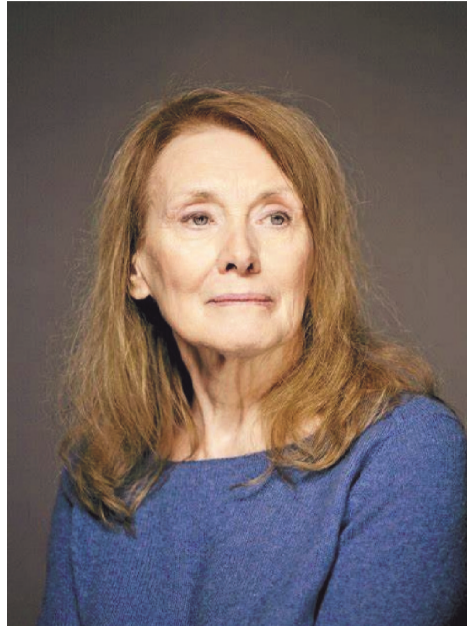
在《超八岁月》的白独白中,安妮·埃尔诺说,她常常在没有课的下午进行写作,写那些教育和文化如何让她叛逆自己所出生的社会阶级的故事。用她的话来说,在一个温柔的年轻母亲形象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迷恋写作的女人,这个女人想要把生活中的每一个事件全部写进一本让人感到震撼的小说之中。只不过,她的写作都是秘密进行的,她没有办法告诉任何人,丈夫也好,母亲也罢。当她陪同丈夫出席活动时,她心里想的都是家中藏在抽屉里的创作手稿,它宛若一颗定时炸弹,悄悄埋在这个看似幸福的家庭内部。夫妻二人的情感危机并非无迹可寻。超8摄影机拍摄的家庭画面越来越少,亲密时光似乎不复存在。安妮所接受的理念是自由和男女平等,然而在婚姻生活中,她所扮演的角色是“奶奶”,是“沉默的后勤管家”,甚至在纪录片开头,当她提到超8摄影机多是丈夫在使用拍摄,一部分原因也是根据夫妻共同生活里的性别分工而定。1980年夏天的西班牙之旅,安妮清醒又痛苦地意识到:“我在他的生活中已然是多

余”。念完这句话,白独白戛然而止,镜头转向一场斗牛表演,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只逐渐筋疲力尽的公牛,最终躺倒在地,被拖出斗牛场。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整个国家处处洋溢着充满希望的喜悦气息,然而,随着《被冻结的女人》(La Femme gelée)的出版,家庭关系愈发紧张。次年,二人分开,丈夫带走了超8摄影机,把之前拍摄的全部胶片和投影设备,还有两个儿子,留给了安妮·埃尔诺。

时间流逝,胶片在角落里静静地沉睡,直到很多年后的一天,安妮·埃尔诺和儿子再次观看这



《超八岁月》纪录片海报



安妮·埃尔诺

丈夫代表了其社会旅程的两个端点:起点和终点。安妮·埃尔诺无疑实现了她的“阶级叛逆”,但是这远远不够,她想要说的话还很多,甚至可以认为,她的文学之路恰恰开始于她有意识地对“阶级叛逆者”这个社会概念概念的探讨与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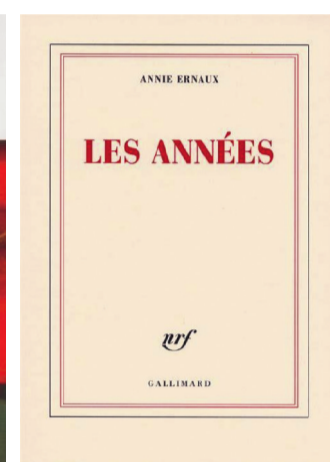
在《超八岁月》的白独白中,安妮·埃尔诺说,她常常在没有课的下午进行写作,写那些教育和文化如何让她叛逆自己所出生的社会阶级的故事。用她的话来说,在一个温柔的年轻母亲形象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迷恋写作的女人,这个女人想要把生活中的每一个事件全部写进一本让人感到震撼的小说之中。只不过,她的写作都是秘密进行的,她没有办法告诉任何人,丈夫也好,母亲也罢。当她陪同丈夫出席活动时,她心里想的都是家中藏在抽屉里的创作手稿,它宛若一颗定时炸弹,悄悄埋在这个看似幸福的家庭内部。夫妻二人的情感危机并非无迹可寻。超8摄影机拍摄的家庭画面越来越少,亲密时光似乎不复存在。安妮所接受的理念是自由和男女平等,然而在婚姻生活中,她所扮演的角色是“奶奶”,是“沉默的后勤管家”,甚至在纪录片开头,当她提到超8摄影机多是丈夫在使用拍摄,一部分原因也是根据夫妻共同生活里的性别分工而定。1980年夏天的西班牙之旅,安妮清醒又痛苦地意识到:“我在他的生活中已然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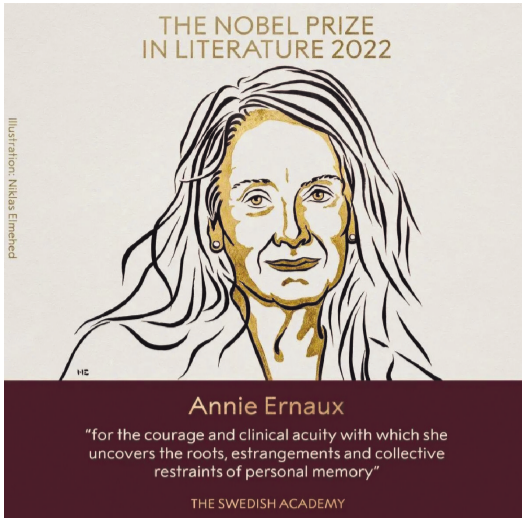
《空衣橱》法文版封面



《位置》法文版封面



《悠悠岁月》法文版封面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

些影像。尘封已久的回忆再度开启,镜头里的很多人却早已不在,包括安妮·埃尔诺的母亲和丈夫。在安妮·埃尔诺眼中,这些在时代大背景下于不经意间拍摄的家庭生活碎片构成了一段无声的时光,而这段无声的时光需要用词语赋予以意义。于是有了这部《超八岁月》。在纪录片的最后,安妮·埃尔诺用温柔却充满力量的声音动情地说道:“这是一个家庭自传的片段。对我而言,这也是一个能让我回望人生至关重要的那几年的契机,重新找寻一点

点洒在过去之上的光芒,一束金色耀眼的光芒,就像那些年乔·达辛在歌曲《秋老虎》中唱的那样。”

《悠悠岁月》中译本出版后,安妮·埃尔诺特别撰写了一篇“致中国读者”,她在文章中提到,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历史不一样,但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无独有偶。在作品合集《书写生活》(Écrire la vie, 2011)的前言中,安妮·埃尔诺写道:“既不是我的生活,也不是他人的生活,甚至不是某一种生活。生活的内容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但在人们各自的方式经历着:身体、教育、对他人的归属、疾病、哀悼。”纪录片《超八岁月》远非简单的怀旧,它见证了一个女人、一个家庭、一个阶级和一个时代。个体的光芒照亮幽暗的历史,集体记忆构建于个体记忆之上,今日的《超八岁月》与彼时的《悠悠岁月》遥相呼应,成为一本个体与时代的“影像之书”。

## 日本“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启动

嘉宾热议中国科幻文学

9月29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由中国作家协会支持创办的日本“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在东京中国文化中心举办首场活动。活动由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日本早川书房、八光分文化联合策划,中国科幻作家王晋康、宝树、七月,八光分文化创始人杨柳,日本科幻作家藤井大洋、科幻翻译家大森望、科幻编辑梅田麻莉绘等共同参加。在热烈的讨论与交流中,中日嘉宾为两国读者带来了一场洋溢着想象力和激情的科幻文学盛宴。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衔文化参赞石永菁到场向活动致贺。她表示,中国和日本文学拥有悠久的互译历史,文学在两国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22年是两国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习近平主席与岸田文雄首相互致贺电。面向未来50年,中日双方都应当继续将文化交流传承下去。此次日本“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的成立,必将为日本读者了解当代中国提供新的平台,为两国文化交流注入新的活力。

在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中,王晋康、宝树、七月向日本读者介绍了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历史、特点,分享了各自走上科幻创作道路的故事,以及各

自与日本科幻接触的经历。大家谈到了从《日本沉没》《铁臂阿童木》《恐龙特急克塞号》到《银河英雄传说》等诸多优秀日本科幻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启发和影响,也谈到了中国科幻作家对于涉及自然灾害、人类命运、文明未来等主题的深入思考和丰富想象。藤井大洋、大森望和梅田麻莉绘则从《猫城记》等作品说起,回顾了自己阅读中国科幻作品的体会,并介绍了日本科幻文学及“京都科幻节”等情况。他们表示,近十年来中国科幻文学发展迅速,《三体》等作品格局宏大、思想深刻,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已成为日本科幻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也激发了日本读者对“大格局”的当代中国科幻文学的浓厚兴趣。通过此次活动,大家对蓬勃发展的中国科幻文学更加充满信心。



杨枫为日本读者介绍了中国科幻创作的整体情况。她说,自梁启超、鲁迅在上世纪初倡导科幻小说以来,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发展不过百年。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是最近十年,中国科幻文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既诞生了以刘慈欣、王晋康、韩松、何夕为代表的建立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根基的中坚力量,也涌现出了以郝景芳、陈楸帆、宝树、七月、顾适等为代表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一大批新生代作家。最近几年,中国每年出版的科幻小说超过500部,优秀作品不胜枚举。期待未来通过两国更多的文学交流,让更多中国优秀科幻作品有机会走进日本,让更多日本读者领略中国科幻小说的独特魅力。

此次活动现场还展示了近年来译成日文的部分中国科幻作品。除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外,王晋康的《天火》及《亚洲文化》个人专辑收录的《水星播种》《生命之歌》《七重外壳》等11篇作品、宝树的《时间之王:宝树短篇杰作集》《三体X:观想之宙》《人人都爱查尔斯》《我们的科幻世界》等6部作品都已被译成日文出版。与会作家还向日本读者介绍了《古蜀》《时间之墟》《群星》等作品,期待它们能早日被译成日文,与日本读者见面。两国科幻界人士还相约于2023年在中国成都举办的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上再次相聚,以科幻为媒介,互学互鉴,畅想人类共同的命运与未来。

“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由中国作家协会与各国文学爱好者共同发起,旨在向海外读者推介中国文学作品,让更多中国作家走向世界。自2021年8月启动以来,得到多国积极响应,目前已在包括日本在内的22个国家设立,开展读书分享、诗歌朗诵等多种形式的活动40余场,为中国文学在海外持续深入的本地化传播打下了良好基础。

(世闻)

## 中欧文化交流的一次积极探索

「世界文明与中国道路论坛——欧洲区域分论坛」召开

9月8日,由世界汉学中心与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世界文明与中国道路论坛——欧洲汉学与中国文明对话”区域论坛召开。论坛由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王健博士主持并致开幕词,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的34名学者与会发言,共计百余位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共聚一堂。

本次会议主旨发言与圆桌论坛环节。圆桌论坛下设“和而不同”与文化多样性、中欧两大文明交流历史研究、欧洲汉学史研究、当代欧洲汉学研究发展与对策、中国典籍翻译与汉学研究五个主题。

论坛伊始,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国际汉学》主编、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张西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郭丽娜,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法国汉学家梅谦立(Thierry Meynard),浙江工商大学特聘教授、韩国汉学家全洪奕,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德国汉学家谢林德(Dennis Schilling)分别作主旨发言。

张西平以《卜弥格与欧洲早期汉学的兴起》为题作了发言。他谈到,波兰汉学家卜弥格(Michel Boym)的汉学成果经德国学者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中国图说》的收录对推进欧洲的中国知识认知起到极大作用;其中医学著作对专业汉学创立者、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Rémusat)有深远影响。卜弥格不仅是中西植物知识西传与开启西人中医研究的第一人,也是链接欧洲传教士汉学与中国汉学的重要学者,其研究有力地推动了中欧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郭丽娜在以《中法对话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趋势》为题的发言中说到:自法国传教士来华促成早期中欧文化对话,到19世纪后中法交流不断加深,推动全球化进程,再到改革开放后中法建立广泛学术合作从而开启新一轮有意义的对话,三百余年的中法对话从单一走向多面、从一方被动走向双向主动互动。未来的中法、中欧对话更需秉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原则,更主动地“走出去”,以包容的心态“引进来”,围绕人类未来发展的主题加强对话,维护与促进多元文明共同发展。

梅谦立以《龙华民与宋明理学》的发言中说到:明末意大利来华传教士龙华民(Niccolò Longobardi)作为“保守主义”的代表,一方面认为前期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等

人对“真儒古教”和“俗儒理学”的切分不符合中国儒家道统,另一方面又以宋儒视角理解整个儒家传统并使用亚里士多德哲学理论分析《理性大全》所载观点,得出宋儒思想是一种“唯物一元论”的结论;在哲学意义上,“削足仍不适履”或是必经之路,随着中欧双方文化同心理与文化共情力的提升,彼此的文化也将在深度的双向认同中获益。

全洪奕在以《明末清初西欧知识分子的东亚形象 and 知识结构》为题的发言中谈到:明末清初耶稣会来华传教士奉行的“适应主义天学”是对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的一种活化,早期传教士如利玛窦等人对儒学的“古今二分”及容斥斥今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激活了被萨义德理论所忽视的“儒教东方”领域并恢复了“正面的东方形象”,后继传教士如法国的白晋(Joachim Bouvet)等人实践的“索隐主义天学”则侧重性地发展了容忍先儒的面向,扩展至“古今肯定”的立场;传教士汉学家为西欧东亚形象的正向构建与中欧文化的相互肯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圆桌论坛的分议题中,学者们从文化的他者性与在地化、文学原型与文化指向、生态文明与全球发展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论坛的最后由张西平教授做总结发言,他说到,“世界文明与中国道路论坛——欧洲汉学与中国文明对话”区域论坛是中欧文化交流机制的积极探索,是双方扩大对话主体、促进文化扩容增质的助推力。论坛汇聚多名中外学者,聚焦学术前沿,完成了一场高层次、高水准的学术对话,让更多人通过欧洲汉学及其研究触摸中国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多元文明走向美美与共提供了学术新力量。

中国和欧洲都拥有丰厚的文化积淀,中国人民与欧洲人民密切的文化交流书写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史。厘清欧洲汉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探讨欧洲汉学的未来发展,对促进中国与欧洲文化深入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此次论坛后,北京语言大学将启动“世界青年创新与发展论坛”,旨在推进构建全球汉学融通互鉴的语体系和美与美的跨文明交流机制,为中西文明比较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等议题提供广阔的讨论空间和研究视野。

(宋闻)



英国画家Rose Wylie作品

世界文坛

SHUI WENTAN